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33

東亞視域中的 近世儒學文獻與思想

鄭吉雄◎編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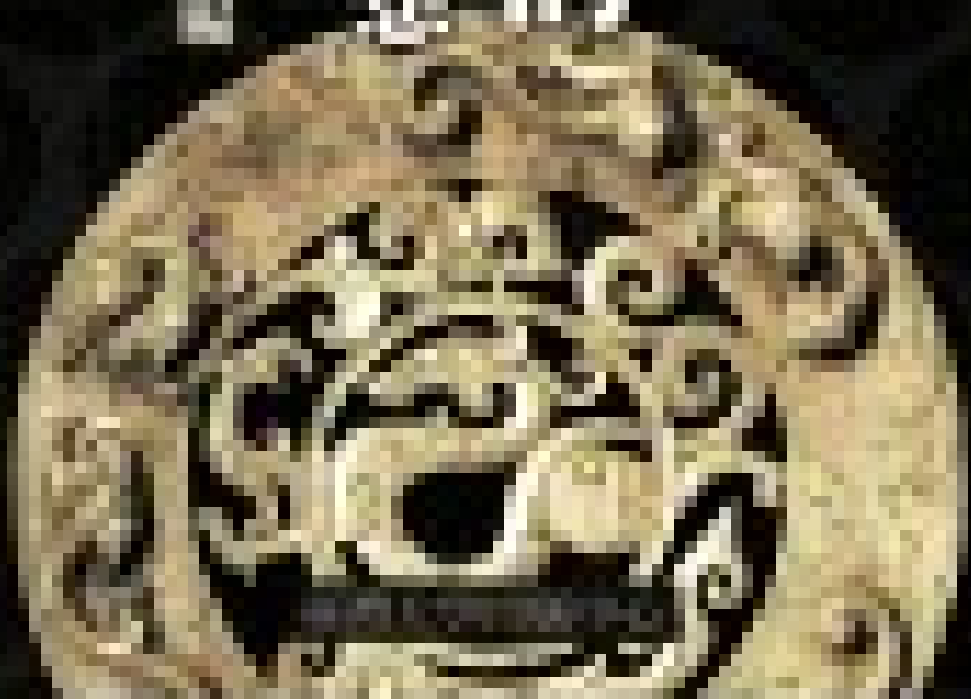


東亞視域中的

東亞視域中的

近世儒學文獻與思想

張其成 著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33

東亞視域中的 近世儒學文獻與思想

鄭吉雄◎編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東亞視域中的近世儒學文獻與思想／鄭吉雄編

---初版---

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5〔民 94〕

438 面；15 * 21 公分

含索引

ISBN 986-00-1690-9（平裝）

1. 儒家 - 論文、講詞等
2. 文獻學 - 論文、講詞等

121.207

94012888

統一編號 1009402056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33

東亞視域中的近世儒學文獻與思想

編 者：鄭吉雄

策劃者：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

(<http://www.eastasia.ntu.edu.tw>)

出版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發行人：李嗣涔

發行所：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地址：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電話：02-23659286

傳真：02-23636905

E-mail：ntuprs@ntu.edu.tw

2007 年 2 月初版二刷

ISBN 986-00-1690-9

定價：新台幣 500 元

序

鄭吉雄^{*}

2002 年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成立，我奉黃俊傑老師之命，承乏東亞文獻研究室的策畫工作，開始推動一連串儒學文獻與思想的研究，其中包括舉辦主題性的學術研討會及小型的學術講論會。本書所收錄的論文，主要是從東亞文獻研究室 2003 年 10 月「東亞儒學文獻（清代）國際學術研討會」、和 2004 年 5 月「臺日韓東亞文獻資源與研究主題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會議論文中，擇優編輯而成。其中因為議題相近，經過徵詢，亦收錄了徐興慶兄於 2003 年 6 月中心舉辦的「東亞、儒學與東亞儒學學術研討會」中發表關於朱舜水研究的論文。周啓榮兄的論文，則是以他於 2004 年 7 月 15 日中心第 21 次學術講論會的講稿為基礎，綴玉成章。

書名題為《東亞視域中的近世儒學文獻與思想》；各篇涉及了中、日、韓近世儒學課題；撰著人則包括了來自臺灣、¹香港、²中國大陸、³韓國、⁴日本⁵和美國⁶的學者。從東亞的視域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員兼東亞文獻研究室召集人。

¹ 筆者之外，還有王基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徐興慶（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和詹海雲（元智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² 劉智鵬（香港嶺南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³ 陳祖武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和彭林教授（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看，本書涵括的議題較豐富，而因為邀請對象分佈較廣，反映的觀點也較多元。但全書的主題，還是集中在近世儒學文獻與儒學思想的關係之上。作為主編者，我除了翻譯伍安祖兄和周啟榮兄的論文為中文外，也對於全書各篇論文作了一些細微而必要的修正，主要是基於統一全書體例的需要，少部分則是將日、韓學者若干較特殊的詞彙，改換成漢語一般的用法。我的原則，是盡量保留原文辭句的語氣和意旨，使不受影響。

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已成立兩年多。能夠在短短兩年之間邀請到那麼多學術界的同道，在一個不算太大的研究範圍中共同撰文論辯，誠為難能之事。每位撰著者文筆各具風格，思辯各擅勝場，論旨固無萬殊之異，議論亦不必歸於一途。在人生逆旅中，我能有如許機緣，與諸良友相與談學論道，深感慶幸。我謹以八年前所撰的舊詩一首，附錄於篇末，一以誌兩年來的學術因緣，一以酬良友深厚的支持之情。詩云：

執手憑高會，析言異轂音。不隨人俯仰，難與俗浮沈。
縛采辭稱貴，緣情味始深。論文千載下，慎莫棄初心。

2005年3月9日序於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

⁴ 李光虎（韓國延世大學哲學系教授）、孫叡徹（韓國漢陽大學中語中文學科教授）、崔一凡（韓國成均館大學儒學東洋學部教授）。

⁵ 水上雅晴（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助手）。

⁶ 伍安祖（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歷史系副主任、副教授）、周啟榮（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文化系教授兼 Spurlock 博物館館長）。

導 言

鄭吉雄^{*}

儒學在東亞文明演進歷程中的重要性，在近數十年，尤其是近幾年來東亞學者的研究下，已顯得愈來愈清楚，成為無庸爭議的事實。近年來筆者與黃俊傑老師以及幾位學術界同仁共同執行「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畫，並創立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以「東亞儒學」為中心兩大研究方向之一，也是基於此一信念。

從理論的層次考察，儒學中以「人」的德性為主體的價值體系，的確足以與世界其他諸文明、諸宗教的核心價值體系，共同成為人類精神文明價值的參照指標。自二十世紀初以來，許多新儒家學者努力從傳統儒學中特別抽繹出具宗教意義的成分，運用西方哲學的分析方法和語彙進行新詮，取得很多有意思的研究成果。這對儒學的研究而言，的確是有貢獻的。

然而，我們若透視東亞儒學的全部內容，其中縱使有若干成份和「宗教」可以互喻，究其大端要旨，則儒學與宗教始終異趣。儒家思想是隨著歷史文化與文明進程的發展，漸次建立並趨於完密的。它的發揚，孔、孟、程、朱等聖哲固然功不可沒；但正如章學誠（實齋，1738-1801）所說，「學於眾人，斯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員兼東亞文獻研究室召集人。

爲聖人」(《文史通義》〈原道〉)，孔孟學說中屬於人類普遍性價值的部分，必然是奠基於最深層的人文文化，是從最廣大的平民生活經驗中領悟到的人生智慧；孔孟思想當然也不可能與他們以前，千百年間的中國人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傳統價值觀念悖離。儒學許多最重要的價值內容，既藉由人類群體生活價值取向的同條共貫來呈現，倫理中的禮俗儀軌，便成爲它主要的寄託所在。儒家禮教產生自人類社群生活的集體自覺，其思想價值也終應落實於社群生活之中。換言之，歷代偉大的儒者，固然抉發了許多重要的儒學觀念，對儒學思想體系的建構作出了貢獻；但從另一個層次看，在歷史的長河裡，儒家思想的許多不變的價值，即使沒有儒者探研，其實也一直普遍存在於人類的生活之中，未嘗凋零；相對上，儒家許多因無法隨歷史轉化而逐漸消亡的觀念，即使有再多的哲人提倡，也很難有續命之機。換言之，像儒家所倡君臣夫婦綱紀之說，即使今天再有大儒提倡，恐亦難以爲繼；反過來說，任何人都有權利宣稱不接受儒學，卻不可能去反對儒者最所信奉的、產生自倫理生活的諸如仁愛、孝順、誠實等倫理價值，以及長幼、養老、扶弱等道德行爲。這些價值與行爲，在東亞地區如何被歷代儒者詮解，如何在歷史脈絡中轉變，都一一在經典載籍裡留下了痕跡。這是筆者認爲，探討儒學不能不植根於文獻研究，而在本書主題上特別強調「文獻」與「思想」的主因之一。

隨著兩千餘年歷史的演變，跨越了東西各國之間萬里之遙，儒學對於東亞地區人民生活價值的主導力和影響力，始終

歷久彌新，而成為東亞精神文明最普遍的基礎。落實在東亞的歷史傳統，儒學的信仰也往往隨著不同時代、不同國度、不同的文化脈絡而有不同的論述與顯現。儒學生命的生生不息，也在此處獲得了堅實的證明。宋明理學家吸收了漢儒象數理念和佛教、道教的若干思想觀念，而建構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乾嘉經儒實踐《易》自強不息之旨，以「學隱」（章太炎《虯書》）的姿態，闡發「完密之至，故無所苟之至；無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龔自珍《定盦文集》〈抱小〉）的考據精神；朝鮮儒哲吸收宋儒的理學觀念以及圖象詮釋方法，闡釋心性義理，創造大量儒學圖象文獻；日本古學派儒者推崇古文獻與禮教，與中國十七世紀以降經世致用一系的思想遙相激盪。借用佛教的譬喻，儒家思想有諸般面相，千變萬化，「如帝釋殿，天珠網覆，珠既明徹，互相影現；所現之影，還能現影，如是重重，不可窮盡」（《華嚴經旨歸·顯經義第七》），東亞儒學隨著時空的轉動，透露出千變萬化的瑰麗光彩。這些累積了兩千餘年的光彩，一一烙印在文獻之中。這是筆者認為，探討儒學不能不植根於文獻研究，而在主題上特強調「文獻」與「思想」的主因之二。

儒學文獻植根於東亞這片土壤，直至十六世紀，才逐漸被傳教士攜至歐洲翻譯流傳。¹含有濃厚儒學色彩的東亞文明，

¹ 最早被歐洲學者翻譯的中國儒家經典，可能是耶穌會士 Michele Ruggiere（1543-1607）以拉丁文翻譯的《大學》，在 1593 年羅馬出版。（此一文獻被納入 Antonio Possevino's *Bibliotheca selecta qua agitur de ratione studiorum*. 參 Knud Lundbeck, "The First European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Works," 收入 *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明顯有別於歐洲、美洲、及中亞細亞思想文明的特色。近年來東亞地區文獻研究風氣十分蓬勃，蒐編和研究成果也極為豐碩，但學術界關於東亞儒學和當代儒學的研究，明顯地朝向哲理分析的方向傾斜，並未真正全面地從東亞文獻中汲取資源。「東亞儒學」和「東亞文獻學」一旦各自分途，兩個領域的優勢便無從互相溝通支援。然而，在從事具體研究時，這種互相溝通又是必需的。例如近三十年來出土的簡帛文獻中，有許多關於子思及戰國儒家關於性、情、內、外等重要觀念的文獻，涉及孔子以後，先秦儒家思想的特性與轉變問題。而由於子思、孟子的思想常被認為是宋明儒陸九淵（象山，1139-1192）、王守仁（陽明，1472-1528）的思想源頭，因此這些簡帛文獻也涉及了儒學史的源流問題。倘若研究者不具備文獻學的知識，透過掌握《禮記》諸篇的語文內容與編集年代，與〈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等出土篇章作比較，並且參用王國維（觀堂、靜安，1877-1927）二重證據法的準則，進行文獻解析，則恐怕連解讀新出土文獻的第一步都無法踏出，更遑論分判思想源流了。這正是哲理分析與文獻分析相須互用、彼此支援的最佳例證。自去年起，筆者推動「出土文獻研究方法研究計畫」，就是希望對這項重要的學術事業略盡綿力。由此可見，東亞儒學和東亞文獻學，雖然各具範疇，各有成就，但唯有以整合的觀念，加強兩個領域知識的交流，才能提升既有的研究，並開發新的課題。這是筆者在主題上特別強調「文獻」與

「思想」的主因之三。

本書在「近世儒學文獻與思想」的主題下，共設立「經學運動的思想視界」、「清儒的文獻研究」、「中日儒學的交涉」、「儒學在朝鮮的發展」四個子題，收錄了十三篇論文。以下分別說明各子題所討論的問題。

關於「經學運動的思想視界」方面收錄論文四篇。劉智鵬和筆者的論文分別討論了清初和清中葉兩位反理學的健將費密（經虞，1625-1701）和戴震（東原，1723-1777）。劉智鵬〈費密與清代經典詮釋的論爭〉指出，費密處於明清之際，率先提倡運用訓詁之法研究經典，達致經世致用的目標，以徹底否定宋明理學的內容和形式，為清代的漢宋之爭寫下了第一道論題。作者也檢討了費密過信經書和訓詁的缺失，以及他將王學末流和整個宋明理學等同起來的偏差。筆者〈戴震氣論與漢儒元氣論的歧異〉則藉由分判戴震與漢儒「氣論」的差異，說明東亞「氣」思想的一個面相。戴震以抨擊宋明理學為目標，將「氣」概念規範在社群的範疇，引導出重視氣質之性、血氣心知的平等思想，把漢儒的氣論從「天上」拉回「人間」。他對於漢儒最講究的神祕主義、宇宙生成論等毫無興趣，對於群體人民的形體生命是否受到維護和公平對待，則據理力爭，寸步不讓。清代儒學思想以「反理學」為主。這兩篇論文掌握了反理學思潮的源起與思想屬性問題，然而，關於「反理學」這個新典範的內涵問題，尤其是它和宋儒、漢儒思想的差異性，還有許多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空間。伍安祖〈抉發經典：作為

本體宇宙呈現的文本意義〉一文，則透過比較的角度，將歐洲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跟中國的乾嘉學術做一個對照，強調清代的考證學所注重的天人關係。作者也討論了清代公羊學「微言大義」的思想，強調公羊學者透過經典文字來體認宇宙的真理，與西方詮釋學重視知識論與方法論有很大的不同。〈抉發經典〉和〈戴震氣論〉二文都提示了研究者在分析清儒考證學時，絕不能忽略文獻以外的形上思維的部分。周啓榮〈明末清初的訓詁學、文獻考證與經籍研究〉一文藉由分析楊慎（用修、升庵，1488-1559）、焦竑（弱侯、澹園，1540-1620）、姚際恆（立方，1647-？）的經典研究，豁然截斷了十六至十七世紀以語文訓詁為主要取向的考證學與十八世紀考證學之間的關係。究竟清中葉的經典考證學能否上溯至明末？或者說明末至清中葉之間是否存在一條清晰的思想史發展線索？此自梁啓超（任公，1873-1929）提出清學為宋明理學一大反動說以來，即為一頗具爭議性的問題，這當然也是一個開放的問題（至少如劉智鵬的論文就承認這條線索的存在）。一世紀以來學術界對於明清思想轉折提出過的理論，至少在十五種以上。本文廣引典籍，辨析入微，其論點是治清學者不能忽視的。

東亞儒者原本就有特別重視「文獻之傳」的傳統，認為「文獻」才是一切人文精神依託的基石。清儒對此尤為重視。本書「清儒的文獻研究」部分，收錄了詹海雲、王基倫和彭林的三篇論文。詹海雲〈全祖望研究的一個側面——談全祖望詩文集整理的文獻價值及其所反映的清代學術現象〉透過分析清初文

獻學大師全祖望（紹衣、謝山，1705-1755）及其朋友、學生的個性，疏解其卒後詩文刊刻爭議所牽涉的學術史問題，既突顯了祖望身前身後與文獻學的不解之緣，同時也提醒我們：一位大師鉅子的學術成就是否得到完善的保存、是否能供後人正確的理解，都取決於文獻整理者是否掌握到其著述的精神血脈。如此，則作為學術的後繼者，我們焉得不以謙卑、恭謹的態度從事文獻整理工作？東亞儒學傳統的重「文」的思想，發展至十八世紀，儒者又特別提出「條理」的觀念：戴震用「分理」、「條理」釋「理」字（《孟子字義疏證》「理」條），錢大昕用「治絲」、「有條不紊」釋《六經》的「經」字（《潛研堂集》〈抱經樓記〉），都視宇宙、人生、文化、經典，為一全體具有高度精密條理的結構。焦循（里堂，1763-1820）作為乾嘉最重要的經儒之一，文理密察更是他的核心價值。例如他治《易》所發明的「旁通、相錯、時行」三例，就是奠基於六十四卦的內部架構之上，突顯意義規律的條理性。而王基倫〈焦循手批《柳文》的評點學意義探究〉從評點學的角度，集中討論焦循疏理唐代古文家柳宗元文的見解，包括作家論、淵源論、技巧論、風格論四方面，為焦循的文理思想做了很細密的疏釋，也等於為焦循「學問之事，以屬文為要。……大之能包括一切，細之能窮極毛髮；繁簡長縮，所不拘也」（《里堂家訓》）一段話，做了最好的注腳。清儒文理密察的思想，當然也貫徹到經學研究和古史研究上。彭林〈論清人的《考工記》研究——以〈輪人〉為例〉一文就以清儒對於《考工記》的三條考證為例，論證了他們面對艱深的經典內容和簡約的古代注解時，能不矜意氣，用謹慎精密的考

證還原本義的學術精神。作者認為清人長於小學，尤擅於名物度數之學，其於《考工記》詮解之成就，則臻於顛峰。事實上，當代的學者之所以能研讀先秦儒家及諸子百家的古籍，泰半仰賴清儒深細的考釋。如果沒有王念孫（懷祖、石臞，1744-1832）、孫詒讓（仲容，1848-1908）等學者整理，許多古籍的內容幾近無法理解。這就證明了貫徹清代二百餘年的文獻學和文理思想，對於當代東亞思想史的研究而言，有多重要了。

關於「中日儒學的交涉」方面，本書收錄了水上雅晴〈近藤重藏與清朝乾嘉期學者的校勘學〉和徐興慶〈朱舜水對東亞儒學發展定位的再詮釋〉二文。水上雅晴試圖以相當於中國嘉慶年間、擔任紅葉山文庫管理者的近藤重藏（守重、勝重、正齋，1771-1829）為題，說明中國考證學東傳，及其在日本被接受、發展的過程。近藤所編著的書籍和目錄，對漢籍的分類，清楚反映出其受《四庫全書總目》的影響。他也受林述齋（1768-1841）的影響，嘗試採用從中國進口的圖書或留存於日本的資料，解析相關問題。此證明日本學者除接受中國的考據學外，並能活用日本所保有的有效資料，發展日本的考證學。作者論證了日本在江戶時代雖因採取鎖國政策，限制了中日學者間直接的交流，但透過書籍的流通，在學術研究上亦取得相當豐碩的成就。這等於闡明了一個漢學藉由文獻而成功流傳域外的案例。至於徐興慶所討論的朱舜水（之瑜，1600-1682）的例子就較為複雜。十七世紀中葉朱舜水以一位來自浙東的亡命儒者的身分東赴日本，秉持對朱子、陽明均有所批判的立

場，其儒學思想已非純粹的朱學或王學所能牢籠，而他又與明清之際複雜的政治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他赴日後，要適應以德川幕府為核心的獨特政體，以及由武士階層產生的價值觀念；這都是大異於中國的新環境。舜水在江戶及水戶講學，與當時日本朱子學、闇齋學和古學等幾個不同的學派有來往，思想上與這些派別的學者有同有異。他竟能進入了當時日本思想界的核心，將以孔子為中心的儒家思想，尤其是經世致用思想和忠義思想傳於彼邦，輔弼德川光圀（1628-1700）刷新藩政，提振教育，建構了幕末日本思想界不可忽視的價值體系。綜合而言，近藤重藏和朱舜水的案例都證明了東亞地區儒學的流傳，必須從中、日、韓各地的特殊背景和儒學主流價值兩方面同時切入，才能觀察全局。

本書關於「儒學在朝鮮的發展」共有四篇主旨不同的論文。李光虎〈從《聖學十圖》看退溪李滉的聖學觀〉從存在論和人性論兩方面分析了李滉（退溪，1501-1570）《聖學十圖》的結構，並探討了退溪整個聖學觀中包括聖學、心法和實踐學問的方法等問題。作者為退溪的同宗後裔，運用帶有朝鮮古文風格的文筆，重新詮釋退溪的思想，在本書中顯得別具特色。關於退溪《聖學十圖》的圖形結構，及其與其他朝鮮儒者所作的儒圖彼此之間的異同，涉及了圖象詮釋的符號、方位、結構和方法等各方面問題，尚待研究者作出補充。學術界一般的理解，韓國儒學主要是傳承朱子理學，各項議題也多圍繞朱子學的理論而開展。這不能說不對；但若過度依恃此一觀點，可能

會讓我們輕忽了韓國儒學其他不同的內容。幸而孫穀徹、崔一凡的論文分別從「點」與「面」兩方面，提出了多元的觀察。孫穀徹〈丁若鏞治《大學》的幾個特點〉以活躍於十八、十九世紀之際的大儒丁若鏞（茶山，1762-1836）為例，指出若鏞五十四歲開始撰寫的《大學公議》，採用漢儒經說的立場，並參以古禮和實學的思考，幾乎在各個方面都反對朱子《大學章句》的見解。其實，從若鏞依《禮記·大學》原本，分為二十七節解說，將之看作敘述一貫的經文，而不採用朱子經一章、傳十章的改本，即可見其立場。若鏞深受西洋科技影響，又曾以精造工械得到正宗的賞識。他的經學立場多採漢學，《易》學尤精象數，和性理學者在路徑上根本不同。崔一凡〈《東儒學案》所見之韓國儒學的學派及其思想特徵〉則以疏析儒者河謙鎮（1870-1946）於1938年編纂的《東儒學案》為主。作者針對河氏的學術思想立場進行解構，指出河氏在思想上屬於性理學兩大派之一的嶺南學派，因此其著書立說，實有其特殊的價值取向。作者在分析《東儒學案》時也鋪陳出朝鮮以「嶺南學派」和「畿湖學派」為主軸，衍生出眾多流派的繁複情況。其中如十七世紀後期，朝鮮理學竟出現過批判朱子學的學風，也有如鄭齊斗（霞谷，1649-1736）這樣的陽明學集大成者。十八世紀以降，則出現了如研究清代考證學的實事求是學派學者金正喜（1786-1856），以及集實學派大成的大儒丁若鏞。這都是研究韓國儒學的學者所不能忽略的重要儒者。

陳祖武〈《李朝實錄》所見乾嘉年間中朝兩國之文獻與學

術)主要以《李朝實錄》之記載為主,從宏觀的角度討論了中、朝之間的文獻交流,為本書「儒學在朝鮮的發展」一節劃下了句點。作者首先指出清代乾隆、嘉慶兩朝,跨李氏朝鮮英宗、正宗和純宗三朝,八十餘年間,朝鮮通過每年數度派遣使臣,維繫兩國關係,購求中土典籍,進行學術交流,為儒學文獻的保存和傳播,作出了甚多貢獻。本文共分三節,既討論了清朝對朝鮮儒學的積極影響,也指出了朝鮮儒學接納了中國儒學後,所作出的獨特發展。像正宗二十二年(1798)編定《四部手圈》,即係直接受中國纂輯《四庫全書》影響。又如中、朝兩國同尊朱子,清廷以朱子為門面,實質倡導經史考證;相對上,朝鮮英宗、正宗、純宗三朝則大量輯印朱子書,全面表彰朱子學,使朱子思想大盛。作者清晰地描繪出一幅東亞儒學傳播的圖象:儒學溯源於中國,而傳播至域外之時,接受的國家亦必依照其風土、文化以及歷史環境,以不同的方式受納,作出各不相同的演變,產生新的理解與發展。東亞儒學內部枝分葉派,有同有異,各有丰采,其深具研究價值,亦在於此。

本書十三篇論文,討論了中、日、韓三地的儒學,涉及板本目錄學、思想史、經學、儒學史、經典詮釋學等幾個重要的領域。各篇論文共同突顯了東亞儒學的主體精神,也展現了東亞各國儒學研究各不相同的議題的內涵。我在上文借用了《華嚴經》「珠既明徹,互相影現」來形容東亞儒學之「珠」的瑰麗多變,本書各篇論文,就是最佳的證明。當然,學術研究的路沒有止境,未來必然還會有更多的研究者,紮實地在浩瀚的